

创新管理新质劳动者 培育打造新质生产力

■ 张晓波

随着科技的高速迭代和全球产业格局变化的深刻演变，国有企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和战略支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和挑战。为达成打造新质生产力的目标，国有企业必须不断强化管理创新。而在众多管理要素中，人力资源管理无疑是关键的一环，尤其是新质劳动者的创新管理，将对国有企业培育和打造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新质生产力是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信息技术、智能制造等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出现将深刻改变传统的生产模式，推动国有企业劳动者的角色和地位发生深刻变化。新质生产力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推动传统转型为新质劳动者，即掌握新技术、新技能，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要求的新劳动者。

求是咨询研究认为，国有企业应紧紧围绕人力资源“选”“用”“育”“留”四个方面，积极开展新质劳动者管理创新工作。

选拔新质劳动者： 科学评估，精准识别

新质生产力的构建，需要有一支高素质、具备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新质劳动者队伍作为支撑。这就要求国有企业在选拔人才时，要更加注重对人才素质能力的科学评估。

一是深入评估新质劳动者素质能力特点。新质劳动者应具备高度的专业素养和技能水平，能够胜任复杂、精细的工作任务；具备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能够不断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具

备团队协作和沟通能力，能够与不同领域的人才共同协作，实现创新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二是构建多元化的新质劳动者选拔渠道。在招聘和选拔新质劳动者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学历、经验和技能，更要关注其潜力、价值观和适应性。通过科学的评估方法，全面、准确地识别出适合企业发展需求的新质劳动者。

使用新质劳动者： 合理配置，激发潜能

在打造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选拔出优秀的新质劳动者只是第一步，合理配置新质劳动者资源，充分发挥他们的潜能，对于提升整体生产力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如何将新质劳动者合理配置到最适合的岗位上，使其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和优势，是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关键。

一是建立完善的新质劳动者数据库。对新质劳动者的技能、经验和兴趣进行深入分析，实现新质劳动者与岗位的精准匹配。在建立数据库的过程中，可以充分借助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手段，如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算法等，对新质劳动者的数据信息进行智能处理和分析，精准识别出新质劳动者的核心技能和潜在优势，为岗位匹配提供更为精准的建议。

二是强化新质劳动者与岗位精准匹配。国企不仅要考虑新质劳动者的专业技能 and 经验是否符合工作岗位的标准和要求，还要关注其个人兴趣和发展方向是否与岗位相符。只有实现精准匹配，才能确保新质劳动者能够在岗位上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实现个人与企业的共赢。

关注他们的个人兴趣、性格特点以及职业规划。通过深入了解他们的职业期望和发展目标，企业可以更加精准地为他们匹配合适的岗位，让他们在岗位上发挥出最大的潜力。

三是优化新质劳动者职业发展规划。国企应该高度重视新质劳动者的职业发展规划工作，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和空间。通过制定针对性的职业发展规划、加强培训和教育、关注心理健康和团队建设等措施，国企可以充分发挥新质劳动者的潜力和优势，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和效益。同时，新质劳动者也能在国企平台上实现个人价值的提升和职业发展的飞跃，实现个人与企业的共赢。

培育新质劳动者： 持续投入，提升效果

在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行动方案指出：“大力加强国有企业基础研究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培养工作”，这一重要举措旨在推动国有企业在新的生产力框架下，重视新质劳动者的持续学习和能力提升。

一是制定科学的新质劳动者培育计划。国企需要针对行业特点和岗位需求，加强技能培训和实践锻炼，提高员工的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建立健全职业教育体系。为适应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应加强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为新质劳动者的培养提供有力支撑。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实现社会教育资源与新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

二是提升新质劳动者培育效果和质量。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国企可以实现对培训过程的精准

管理和优化，制定出更加符合新质劳动者特点的培训和方案。同时，大数据还可以帮助国企对培训效果进行量化评估，为后续的改进提供依据，持续提高培训效果和质量。

三是持续投入新质劳动者培育。为培养更多的新质劳动者，国企应持续加大对基础研究和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投入，还需要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等单位的合作，共同推动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加强新质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更加准确地把握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趋势，推动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是培养新质劳动者的必然要求。提供更加贴近实际的专业技能和知识，不断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加强教育资源与产业需求的对接，才能培养出更多具备专业、技能素养和实践能力的新的劳动者。

留住新质劳动者： 优化机制，创造价值

在新的生产力框架下，国企劳动者的角色和地位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他们不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力，而是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新型劳动者。为充分激发这些新型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国企需要建立健全更加精准灵活、规范高效的收入分配机制。

在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行动方案指出：“实行更加灵活、具有竞争优势的工资总额决定和增长机制，以及完善核心关键人才薪酬制度和建立激励机制”，其重要意义在于通过完善薪酬激励机制，激发国有企业新质劳动者的潜能和工作热情，还能够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

一是完善新质劳动者激励机制。激发新质劳动者潜能和工作热情的关键在

于完善激励机制，包括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两个重要方面。国有企业应根据不同岗位、不同能力层次的新质劳动者，制定个性化的薪酬激励机制。同时，薪酬激励机制还应具备市场竞争力、具有竞争性和公平性，既能激励员工积极工作。

长期激励机制是构建新质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紧密利益共同体的关键所在。国企通过采用股权激励、利润分享等多种方式，可以激发新质劳动者工作热情和创新精神，提升企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企业还应注意激励措施的公平性和透明性，以及建立健全的考核和反馈机制，确保激励措施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使新质劳动者与组织企业形成更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二是营造新质劳动者创新环境。创新是推动企业发展的关键动力，无论是科技创新、管理创新还是服务创新，都离不开新质劳动者的积极参与和勇敢尝试。为新质劳动者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和氛围，包括提供先进的工作设备、完善的工作制度以及宽松的创新氛围等。通过优化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让新质劳动者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和创新精神，为企业和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要从制度层面出发，为创新提供良好的环境条件，鼓励试错改进、勇于创新探索，为新质劳动者建立相应的创新激励机制。

综上所述，国企围绕“选、用、育、留”四个方面，持续探索人力资源管理创新的新路径，不断优化相应机制，实现“以人为本”，构建新质劳动者队伍，夯实价值创造的基础，助力打造新质生产力。■

（作者系北京求是联合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咨询总监兼企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两个经济深度转型不可回避

■ 滕泰

有两个经济深度转型已经不可回避。第一个转型是供给结构的转型。过去几年里面出现一种错误的倾向，把制造业的发展跟服务业的发展对立起来，片面强调提高制造业的占比提高。农业是基础，制造业是一个大国竞争力的体现，但不论是农业的重要性，还是制造业的重要性的水平，都不是体现在它在经济内部的占比上。

100年前农业在中国经济的占比是多少？肯定是80%以上。但是那个时候人们吃不饱饭，农业解决不了温饱问题。现在中国农业在GDP的占比是多少？7%左右，但是中国农业的产量早已提高了千百倍，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也早就解决了。所以农业的重要性不体现在占比上，体现在它的技术水平、农业产量和质量上。农业发达，不在农业自身的变化，而是因为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和占比提高。

工业和服务业的关系也是一样。在1990年代初期的时候，我们的服务业在GDP的占比只有30%多，那个时候我们的制造业、农业生产力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2000年前后我们的服务业占比提高到40%以上，挤占和降低了工业和农业的占比约10个百分点，结果中国制造业的全球竞争能力已经初步展现；如今，中国服务业达到了百分之五十以上，又挤占和降低了农业和工业十个百分点的占比，但是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变成了全球第一——所以，服务业发展和占比提升，为工业提供了人才、科研、商业流通、更高效的协作、更专业的社会分工、更低的成本……服务业的发展和占比提高，不但不会影响制造业的发展，反而是促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

我们很多部门和地方政府，还没有深刻地领会这些经济规律和未来趋势，还错误地把制造业占比当做高质量发展指标——如果制造业占比真的是高质量

指标，中国很多生产力落后的省份就已经“超越”了北京、上海？美国那些铁锈地带的经济体是否比硅谷更发达？很多企业家也把制造业和服务业对立起来，尤其是很多传统制造业企业家，动辄公开攻击互联网和其他服务业不创造价值，这些都是十分落后的陈旧错误思想，会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从就业上来看，我们也要深刻理解未来就业的结构的变化趋势。当前，我国农业就业人口约1.7亿，工业就业人口约2.3亿。十年以后，虽然农业和工业的产量会大幅提升，但是由于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农业就业人口大概率会降到一个亿以下，工业就业人口可能会降到2亿以下。所以，未来工业和农业不但都创造不了更多的就业，反而还会释放出几千万的剩余劳动力，这些主要靠服务业来吸纳。

千万不要从现在的经济业态出发，拘泥于当前的优势而拒绝未来的战略改变。一旦智能工厂时代来临，很多地区很多企业曾经的优势会在一夜之间荡然无存。很多北方省份还在把自己的重资产增长模式当优势，这怎么适应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时代的产业结构变化？

怎么理解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在经济起飞阶段多搞一点投资，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每一块钱的投资不仅有可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而且通常都有几倍的乘数效应。但是在工业化后期和城镇化后期还保持那么高的投资率，势必造成极大的社会资源浪费。中国目前的投资率，也就是新增资本形成占GDP的比例，仍然高达42%以上，且已经连续十几年保持这么高的水平。而其他国家这个投资率比重是多少呢？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基本上都在20%到25%，印度的投资率也只有27%。我们比其他国家高了15到20个百分点。

减少和低效投资和无效投资，总量上未来能减少多少呢？假设我们在未来十年或者五年也能把投资率降低到25%，至少降到30%以下的水平。那么每年至少有10万亿元以上的低效和无效投资会节省出来。而同样的财政支出如果用于给居民发消费券，消费乘数大于3——也就是说，如果把每年10万亿的低效投资变成居民收入和消费的话，就会产生30万亿的总需求，那么扩大内需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总体看，只有需求扩张带来的复苏才是可持续的。面对总需求不足，结构性改革与逆周期调节，是扩大内需的左右两只手，都不可偏废。供给结构转型和需求结构转型的改革都如箭在弦，必须要抓紧时机推进，但这与逆周期宏观政策扩大内需并不矛盾。

逆周期宏观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还有很大的降息空间。考虑到我们的非金融企业贷款总额在150万亿元，如果能够降息一个百分点的话，非金融企业的利润可以增加1.5万亿元；考虑到我们的居民住房按揭和信贷消费信贷的总额在80万亿左右，如果实际利率能够降低一个百分点的话，中国居民的利息支出也会减少8000亿；我们的政府债务，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债务，在降息过程中其利息成本支出也会大幅减少。

然而，我们的货币政策决策观念，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防通货膨胀、防股市泡沫、防房地产价格上涨、防人民币汇率贬值等“过去式”的观念中。但是现在中国经济已经不是这样的形势，应该尽快转向防止通货紧缩、防止股市下跌带来风险，防止房地产进一步下跌带来风险，甚至参考日本经验容忍汇率适当贬值，不但促进本国产品出口，也带来大量海外游客，促进本国市场繁荣。■

（作者系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文章来源：经济转型研究）

当前亟待出清的六大风险

■ 刘尚希

通过对风险的认识构建了观察风险的框架，经济领域收入-支出，资产-负债、流量-存量等循环体现了风险的循环，个体的风险可能外化、扩散为公共的风险。只有出清风险才能改变预期，稳预期的关键在风险预期。他进一步指出，当前中国经济中亟待出清的风险，包括房地产长期累积的结构性风险、政府债务的结构性风险、金融风险等。

一是房地产长期累积的结构性风险。房地产业有一个“3456”的说法，当然这是形象化描述，不是精准定量。房地产增加值在GDP中占30%，在贷款中占40%，在地方财政收入中占50%，在居民资产中占60%。可以看出，房地产对于整个经济的影响非常大。现在房地产面临流动性风险，怎么解决？银行政策做了调整，但是房地产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风险越大银行越不敢贷，很多企业面临生存困境，房地产行业风险公共化的趋势还未得到有效遏制。对于房地产行业而言，不仅仅是风险救援的问题，还有转型的问题。

房地产转型与城乡二元结构和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相关。过去是计划经济，实际上还有一个对应的“计划社会”，比如体制内、体制外，干部、工人身份等等，计划社会就是让社会和计划经济相匹配和适应，这就涉及社会转型。核心是加快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现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到50%，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60%，两者相差17%左右。房地产转型发展要与人口流动、农民工市民化结合起来。房地产行业的风险不是现在形成的，是长期累积的，与社会结构有紧密关系。

二是政府债务的结构性风险。这类

风险涉及央地债务调整问题，现在地方债务规模大、占比高，中央债务规模小、占比低，这种债务结构不利于风险控制。去年发行特别国债，中央转移给地方使用，今年开始大规模增加中央债务，发行超长期国债。中央债务增加是万亿级的，地方专项债增加一千亿，这种变化反映了央地债务结构调整。

三是金融风险。最大的问题是估值稳定，估值稳定和金融有什么关系？银行贷款需要抵押物，抵押物估值现在和以前不一样，随着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走低，财富存量贬值，银行的贷款抵押物是升值还是贬值？要做评估。如果银行贷款的抵押物普遍贬值，银行贷款自然就会下降。市值稳定也很重要，物价下行，钱更值钱，对老百姓来说眼前是好事，但对企业来说就是灾难。因为收入是名义的，企业利润也是名义的，当价格下降的时候，企业利润减少，估值也会下降，居民收入也难以增长。从当前来看，估值稳定比市值稳定更加重要。

四是安全领域的结构性风险。比如产权保护（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合规性风险、社会保障风险等，要通过结构性改革使得这些风险出清。

五是增长的结构性的风险。比如物价变化，为正数，意味着名义增长率大于实际增长率；而当物价下行意味着抬高了实际增长率。再如顺差，顺差会带动GDP增长，但是顺差越大意味着对外循环的依赖越大，这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而言隐含着风险。

六是产业结构升级的结构性风险。数字化智能化、低碳化中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替代也会产生风险。■

（本文节选自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刘尚希《如何“看见”宏观经济风险》的主题演讲。文章来源：腾讯财经）